



户撒皇岩寺 夏广云摄



户撒芒棒白塔 张亚萍摄

政協樓一則



一則
原曉川宣抚司大堂



早乐东新墓

目 录

前 言.....	金玉龙 (1)
五十年代前期工作的一些回忆.....	钱发昌 (1)
陇川工作的片段回忆.....	朱子才 (15)
早乐东坟墓重新修建.....	邹开先 (29)
怀念金板相同志.....	段庆国 (32)
我的回忆.....	钱小田 (37)
董友银谈早乐东.....	王绍华 (44)
多永安传略.....	姜德发 (48)
在我记忆中的邦瓦山官——排早堵.....	谢尚芬 (58)
家父二三事.....	多永龄 (70)
回忆宗崩委员.....	王绍华 (75)
基督教、天主教在陇川传播情况录.....	王绍华 (78)
陇川县广山寨教会学校的由来.....	王绍华 (87)
散记“董萨”.....	杨文彬 (89)
吕法山顶的新寺观.....	刀小阮 (95)
早乐东山官调查.....	桑跃华 (97)
杨少臣遗稿摘抄.....	(105)
土司的霜降礼仪及其他.....	多永龄 (122)
陇川第一中学简叙.....	鲁大良 (130)
陇川县电影事业回顾.....	刀小阮 (145)
陇川教育拾零.....	韩自康 (150)
禁忌琐记.....	李其山 (152)

英雇佣军中的三个景颇人.....	雷冯辉	(158)
回忆王子树剿匪.....	吴双喜 姜德发	(169)
“徐学惠事件”的前前后后.....	李其山	(171)
章凤匪患目击记.....	李国儒	(174)
人民政协志初稿简述.....		(177)
附 录.....		(207)
编 后.....		(211)

五十年代前期工作的 一些回忆

钱发昌

陇川工作团于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先后在王子树、邦瓦、曼胆、户弄、户瓦、城子等几个点开展了工作。当年七月我们省民族工作队第二大队到陇川后，又在勐典、曼面、曼软、景限、清平、岗巴、弄弄等七个点开展了工作。一九五三年春建立了十二个乡级人民政权。城子点尚未建政。

省民族工作队

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为了开展保山专区边疆县（今德宏州）的工作，于一九五二年四月组建了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队。参加工作队的人员有：云南民族学院第一期毕业的部分学员，民族学院政策研究乙班第二期学员，还有省直各有关部门的机关干部，大专院校的部分师生，西南民族学院第一期（云南）毕业生……。这一决定是由省委书记宋任穷同志在云南民族学院礼堂宣布的。

在动员大会上宋任穷同志作了《反对帝国主义，加强民

民族团结》的报告。对保山专区边疆县政治、经济情况及对敌斗争形势，我们党采取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队的任务等作了具体讲解。并深刻地分析了“边疆民族”四个字的两个特点。说明边疆民族工作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他指出，民族上层就是与群众有联系的各民族领袖人物。他们对本民族的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剥削，有阶级矛盾的一面，在长期反对民族压迫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也有保卫祖国领土，保护本民族利益，受到群众拥护的一面。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方法应有别于内地，对与群众有联系的各民族领袖人物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工作队有三条任务：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加强民族团结；三是建立民族区域自治。

工作队在云南民院集训期间，还听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张冲等领导同志的讲话，学习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指示。邀请由保山边疆县去的学员介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当时传说“要到芒市坝，先把老婆嫁”“要到耿马，先把棺材买下”的说法。说明疾病、瘟疫流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工作队人员中有的产生了怕杀头，怕病死，怕艰苦等的错误思想。当时领导上对这些问题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十分具体、深入、细致的。周保中同志亲自检查工作队的的生活安排，发现队员没有喝水的背壶，当即指示每人配发背壶一个，油布一张。集训结束后，由云南民族学院副院长王连芳、省边委秘书长马曜带领，编成三个中队，与省医疗队一道，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中旬乘木炭车离开昆明，五月下旬到达保山。到了保山后，与中共保山地方工作委员会抽调的一批转业军人和“地干班”、“民干班”学

员混合编队，组成省民族工作队两个大队。第一大队由第一组到第十四组，分配在潞西县；第二大队由第十五组至第二十一组，分配到陇川工作。第二大队的大队长是马耀，副大队长是姚文斋、王子义（姚、王是军队转业干部）、温智舟（中共陇川工委副书记）。

从保山到芒市的旅途中行李用马车运，人员步行，到达芒市后，参加了边疆工作会议。从芒市到陇川，行李改用马帮驮运，人步行。从保山到陇川的伙食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自己动手挑水做饭吃。七月十六日到达章凤，中共陇川工委在章凤主持召开了工委工作团各组组长及省民族工作队联席会议。会议上介绍了陇川情况，同时布置了工作、任务，还在章凤部队驻地举行联欢晚会。

在县工委统一领导下，省民族工作队第二大队一百五十余人，组织了下列各工作组，分别开展新区工作：第十五组驻曼面；第十六组驻邦达（今瑞丽猛典）；第十七组驻景嘎；第十八组驻赵家寨；第十九组驻瑞丽南京里；第二十组驻幕水；第二十一组驻清平。大队部设在拱山，大队部直接掌握的有流动组、生产组、调研组。七月二十三日各组分赴各点工作（注：为了适应当时斗争形势需要，遇到紧急情况各组能相互呼应。九月新组建了曼软工作组，将二十组转移到岗巴，赴赵家寨的十八组转移到杉木笼，十月又由杉木笼转移到弄弄）。

初 到 曼 面

我们第十五组的组长是李万福，副组长是郑同仁、曾德

鑫（九月李、曾二人调走后组长是郑同仁，副组长是蒋兆洪），并有姚副队长和我们住在一起指导工作。七月二十三日到曼面后暂住曼面梁子街原司拉山办事处的草棚里。第二天召开了包括山官、头人、保甲长等十多人的上层座谈会，说明来意，并与他们讨论工作问题。我们初到就抓住街子天的时间，宣传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坚决剿匪、巩固国防的公告，书写有关民族政策的标语，喊出防匪肃特的口号，展览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相片和抗美援朝的宣传画等，适时地进行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宣传教育。群众反映很好，接着到各村寨结合看病给药，送一些针线、宣传画等礼品，普遍和群众见了面。与此同时我们就割青茅草、砍树、扛竹子自己动手盖房子，经过几天的努力，盖起了草顶竹篱笆的三间住房，一间伙房，初步解决了住房问题。

曼面曾经是杨绍祥、张明黑匪徒盘踞活动的地方，经我军进剿于一九五二年春逃往国外，有的潜伏下来。逃到国外的国民党李弥残部，扬言要反攻大陆，“双十要占领陇川”等等，谣言很多。实际上敌特有的派遣策反，有的行动破坏，也曾有图谋暴动的案件发生。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和敌人的破坏，群众对我们存在有怀疑顾虑。十月初，刚转移到杉木笼不久，我第十八组就遭到一股土匪的袭击。组长徐家兴、副组长杜树德，还有高天宝同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鲁全怀同志负伤。

在这种情况下，陇川工委指示，“工作队要做好战斗准备工作，同时开展做好事活动”。我们组一部分同志白天挖战壕、筑碉堡、盖掩蔽部；另一部分同志到各村寨开展做好

事、交朋友、团结民族上层的工作。晚上大家轮流站岗放哨，备战工作紧张地进行了两个多月。有一次副大队长王子义同志来曼面检查工作，我们问他：“全组不到二十人，为什么要挖那么多交通壕？”他说：“你们这里要准备一个营兵力的战备设施，还要继续大干。”号召我们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陇川工委曾指示，一些工作组必要时可以转移，带走最可靠的积极分子，同时命令王子树、邦瓦、曼面三个工作组必须死守，不准撤退。决定将其他组的几位体弱多病的同志集中到这三个点，不久，杨登云等病号上曼面来了。到十月中旬，我们挖的交通壕、单人掩体等军事设施已经把附近的几个山头连接起来了。同时抓紧军事训练，由部队转业的同志任教员，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投掷手榴弹、瞄准射击、利用地形地物等。一九五三年元旦，进行打靶演习。

做好事交朋友

当时做好事包括劳动服务、看病给药、举办小规模救济等三个方面。

劳动服务的内容有各式各样，工作组见到群众做些什么活，就参加做什么活。如薅秧、舂米、砍柴、挖地等等，采取边劳动边进行交谈和了解情况，看到群众需要我们帮做的事，就主动去做。六官寨有一位孤老人的房子漏雨，工作组就去割茅草、砍竹子，把房子修补好。老康寨、大怕浪寨两位孤老人病故，我们也主动去帮助埋葬。还有掏洗水井，帮助打扫环境卫生等等。

治病给药是接近群众和联系群众的好方法。我们的卫生员下到村寨，轻病患者自动拢来就诊，甚至还有一些围观者。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接触很多人，进行宣传教育。看病不要钱，治好了病可以扩大政治影响。当时的卫生工作真是接近群众和联系群众的先锋。我们十五组的卫生人员有西南防疫队2人，省医疗队2人，他们白天背着药包跟随着各小组出诊，上门治病。但在长期受鬼神迷信思想束缚的少数民族群众中，破除迷信，却不是轻易办得到的。一些患重病者信鬼不信医药，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许多治好的病例解释，才逐步相信我们的医药。为了多给群众看病，卫生员教我们使用几种常见病的药，自制药袋给我们随时给人治病。

开展小规模农贷和救济。通过劳动服务、看病给药，了解到一些群众的疾苦，就着手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农贷和救济，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主要是解决耕牛、农具、籽种等的困难，缺牛的只能是两户贷一头牛，每头贷人民币40万元（现40元）左右，还从保山调来一些麦种、豆种发放。上邓中寨刘春德（困难户）工作组贷款给他购买山羊发展生产。看到一些孤老人的生活困难，也进行了救济，我们有的同志还把自己的衣服、毛巾等送给老乡。

总之通过劳动服务、看病给药、开展小规模农贷和救济，群众逐步了解我们，我们也了解了群众，并结交了各方面的朋友。首先是通过民族上层广泛的接触老人、妇女、青年等。其次在交朋友的过程中逐步发现和培养劳动人民出身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团结民族上层的工作也是交朋友的重要内容，对他们的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发扬积极因素，逐步克服消极因素。我们到各村寨开展工作，事先都要

把工作内容告诉他们，同他们协商，争取他们的支持。村民大会仍由他们召集，让他们先讲话，工作队接着讲解形势、政策等内容。

反帝爱国教育

九月下旬十月初，敌人活动嚣张，谣言很多。根据县工委指示，我们组在群众中开展了反帝爱国教育活动。

首先普遍宣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用世界政治形势地图通俗易懂地讲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在形势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了对帝国主义和匪特的控诉活动，并以共产党、国民党两个时代的情况进行对比提高认识。曼面组于十月根据侦察到的情报，将图谋暴乱的两个头头及时抓捕归案，次日在曼面街天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通过两个多月的反帝爱国教育，特别是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深深地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涌现出了28个积极分子和骨干，为建立乡一级政权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三年初吸收参加工作的有6人，景颇族4人，汉族2人。

一九五三年春节后，召开了曼面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协商选举产生了乡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正式成立曼面乡人民政府。乡长由威望较高的尹宋山官翁诺担任，副乡长由一名汉族及一名景颇族的基本群众担任，把三个民族上层人物安置为乡人民政府委员，三个民族上层为乡人民代表，做

到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实践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的，是能同我们合作共事的。

安 心 边 疆

我们十五组配备有两位景颇族干部，岳太吉是云南民族学院学员，石麻南是保山民干班学员，就请他们教景颇语。每天早上学几句，白天到农村去检验，边学边用，不久两位民族干部离开了工作组，我们就拜群众为师，结合形势和任务抓紧学习。为了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采取边调查了解情况，边学习民族语言的方法，学会了就向群众宣讲。在学习民族语言中出过不少洋相，但是我们不灰心，老老实实地学，群众真心实意地教，认认真真地纠正讲错了的词汇和发错了的语音。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实践，分配到景颇族村寨工作的几个同志，基本上做到能用景颇语讲解政策和时事。在汉族村寨工作的同志也学会简单的民族用语。通过做好事、交朋友、学习民族语言，消除了隔阂，群众把我们当成自己人，有的还给我们起了景颇族的名字，干部群众关系亲密无间。

我们工作组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从北方来的军队转业干部，有边纵下来的同志，多数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做好工作组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完成各项任务的保证。记得当时主要采取三项措施：

一、严格党、团组织生活，要求党、团员起好先锋模范作用。曼面团小组由蒋兆洪、李文清和我三人组成，定期过

组织生活，互相勉励，有点缺点就互相帮助。参加听党课，党员同志与我们谈心，鼓励我们争取入党，党支部于一九五三年元月八日，吸收我和王留锁同志入党。这期间党员同志和军队转业下来的同志真正起到了骨干带头作用。

二、严格行政生活，坚持全组同志每十天一晚上的行政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性的内容是检查中共保山地委规定的《民族工作队十项守则》的执行情况，检查思想上是否安心。当时省委交待的三条任务要求半年内完成，半年过去了还是走不了，有的同志思乡心切，想回内地去。所以普遍检查“半年思想”，保证安下心来，做好工作。

三、开展评好活动。条件有三：①做好事多；②交朋友多；③学习民族语言多。根据这三条评出一、二、三等。陇川工委每开一次扩干会或全干会都开展评比，并将评选结果在大会上公布表扬，还发给笔记本之类的奖品，以资鼓励。

尽管工作组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物质条件差，待遇低，工作艰苦，敌情复杂，但是大家热情很高，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如手足，工作队内部真正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局面。一九五三年四月初，省民族工作队完成了历史使命，撤销了建制，按工作需要有的同志回原单位去了，有的同志充实县直机关调到别县去工作。留下来的同志全部划归陇川县的编制，我们十五组留下少数几个同志帮助乡干部和当地吸收的干部一道搞团结生产工作。

培养民族干部

在边疆民族工作中，我们党一向非常重视培养民族干部

的工作，把培养提拔民族干部作为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中心环节来抓紧抓好。

记得省民族工作队还在云南民族学院集训期间，省委领导宋任穷等同志就一再强调培养民族干部，要求我们到边疆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着重培养当地少数民族自己的乡长、区长、县长，要培养出自己的上级来。我们省民族工作队第二大队到达陇川后，保山地委、陇川工委都反复要求，到农村后要在群众中发现培养积极骨干分子，从中选拔较优秀的青年参加工作。

我们在曼面大帕浪村开展工作时，发现张乔宽的父亲思想比较进步，他家有三个青年，我们就经常到他家去交谈，做些好事，后来他们一家都把我们当成亲人看待，对我们无话不谈。一九五三年初，曼面组先后动员了七个农村青年出来参加工作（景颇族4人、汉族3人），张乔宽就是其中之一。她出来参加工作还没有几天，她的胞弟麻汤就又跑来找我们，坚决要求参加工作，不再回去了。姐弟二人都参加了工作，父母也很高兴。这批参加工作的农村青年都送到县民族干部训练班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回到本乡工作。一九五三年三月底省民族工作队的建制撤销，多数同志已调走了，曼面组就只留下我们三个外来干部，其余就都是本地的乡干部和新吸收的同志。

我们组新吸收的七个新干部中最后巩固下来了五人。

一九五四年春，县工委抽调一批力量开辟拉线、章凤、户兰、拱外、拱帕、瓦幕、赵家寨等七个新区的工作。民族干部的比例增长了，干部结构与五二年比较，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任拱帕工作组组长，全组十个人，本地景颇族就有六

人，两个副组长中有一个就是景颇族干部。其他各组的情况也与我们组大体相似。各组都配备一名当地民族干部任副组长，景颇族地区由景颇族干部任副组长，傣族地区由傣族干部任副组长。丁老五同志就是在这一时期担任瓦幕工作组副组长的。

我们拱帕工作组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回忆起来有如下一些情况：

1、工作上勤布置，不仅要布置任务，还要交待工作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并勤于收集汇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批民族干部文化、汉语水平低，我们三个外来干部在景颇族地区工作一年多后，学到了一些景颇语，在语言上没有多大隔阂了，具备了帮助他们的条件。在开始的一段时间中，我们一般采取早上学习政治时事，白天分三、四个小组到各村寨召开一些小型群众会，个别走访，了解情况；晚上收集汇报，或者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再让他们独立工作。这一时期他们感到没有文化，工作起来很吃力，所以学习文化很积极，有的带着识字课本，有空就学习，不懂就问。

2、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克服缺点。外来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之间发生矛盾或争吵，外来干部负主要责任，要求严格一些。有一次卫生员（外来干部）和尚老二同志（邦瓦乡弄恒寨人）争吵，我们及时对卫生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制止了争吵，然后对尚老二同志作个别教育帮助，缓解了矛盾。

3、对不安心工作自动回家的民族干部，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回到工作岗位上来。我们组里有一个姓尚的女同志（广瓦寨人）因为在工作上感到困难而苦恼，加上其母亲

拉后腿，就自动离开岗位回家去了。几次到她家去做她本人和母亲的工作，并把她的津贴费送去，经过几次工作终于回来了。

培养民族干部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大胆提拔使用。

一九五四年，我在云南民族学院学习我国第一部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条文时，领导上辅导课时讲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容，一是民族化，二是自治权。民族化是行使自治权的必要条件。民族化有几个方面，而核心的问题是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自治地方的行政领导干部必须由实行自治的民族干部担任，自治机关组成人员中的民族干部必须和这个民族在当地民族中的比例相称，并切实保障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领导同志向我们讲解说：“少数民族干部来自本民族群众，同本民族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了解本民族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他们与群众的联系‘用刀子也割不断’。只有依靠他们，党的事业才能在少数民族中生根、开花、结果。”

一九五五年五月，我刚到清平区工作不久，就接到陇川工委关于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建立党的指示，以及培养提拔使用民族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的计划，这个计划对各区、各科室都有具体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把培养民族干部工作的重点转到大胆提拔使用人员，并且采取措施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同时继续吸收农村各民族优秀青年参加工作。当时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建党的要求，是从边疆少数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从党员八项标准中概括出来的五项条件执行，五项条件是：1、历史清楚；2、政治可靠；3、衷心拥护党；4、愿为党积极工作；5、热爱祖国。具备这些条件就可以

吸收入党，入党后再加强教育锻炼，使之逐步达到八条标准。

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德宏州《团结报》开展关于培养民族干部的大讨论，陇川县发表讨论文章的有组织部长张天喜和曹志远、吴大缙、罗必康等人，从不同角度谈各人的心得体会，这场大讨论使我得到了不少收获。

经过两年的努力，到一九五六年底已经有一批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到县、区领导岗位上来。前面提到的张乔宽这时担任民政科副科长。县、区、乡三级政权机关真正实现了各族人民当家做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使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前进了一大步。

回顾五十年代前期培养提拔民族干部的基本做法，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一、上送学习。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每年都选送一批各民族优秀青年和在职干部到保山、昆明学习，或送到成都、北京去深造。县里还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刚从农村出来参加工作的同志，经过短期培训后就到岗位上工作。

二、不断克服思想上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残余的影响。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一般说来在当时的外来干部接受党的教育较早些，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也较强，肩负着培养民族干部的责任，工作积极热情。民族干部参加工作不久，要求学习要求进步迫切。但是另一方面，有的外来干部对民族干部要求过高，对某些风俗习惯有些看不惯，不太理解心理特点，对民族干部帮助和关心不够，甚至看不起他们，不尊重他们。在这种情绪影响下，民族干部有的往往流露出对外来干部的某种反感情绪，影响团结与进步。当时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是，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